庚子事变中清帝国的决策问题

邓耿

庚子事变是中国近代受到损失最大、丧失主权最多的一次事变。在《辛丑条约》中，清政府代表中国被迫接受了极其苛刻而屈辱的条件，以换取苟延残喘于一时。这次沉痛的经历不仅拖垮了维持清政府统治的官僚体制和士大夫阶级，也直接导致了先进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的觉悟，并最终在十年后建立了中华民国。围绕这次事变起因的各种论述早已汗牛充栋，本文将仅仅就清政府内部的决策过程作一分析。

戊戌变法之后，德宗被慈禧软禁在中南海瀛台。由于对德宗的猜疑日益加深，慈禧开始谋求废去德宗，另立新君。在这一过程中，端郡王载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一系列政治活动，拉拢政治上守旧的满族王公大臣以及汉族官僚，企图在这场博弈中牟取吴永所谓“非常之利”。慈禧选中了他的儿子溥儁，欲立他为皇位继承人。然而戊戌之后，西方各国与日本始终关注着中国这种政出闺门的不正常状况，保守势力代表的封闭政策也与列强在华的经济、政治势力扩张相矛盾。在废立新君这件大事上，慈禧想试探列强的底牌。于是她接受了荣禄的意见，先立溥儁为大阿哥，作为非正式的皇位继承人，并借授李鸿章职位的名义让李鸿章向前来探望的各国使节打探态度。但各国的态度让慈禧打消了立即废立的想法。

此时清政府的中枢机关由于戊戌变法后保守势力的反扑以及开明人士如恭亲王、翁同和的去职已经日趋保守和黑暗，庆亲王缺乏领导才能，难以驾驭复杂的局势，一些极端保守的官僚如徐桐之辈又从行将合上的棺材中爬出来，部分心怀鬼胎的满族贵族同载漪勾结起来阴谋篡位，在戊戌变法中残存下来的比较明智的官员此时的处境极为艰难，不久还遭到了更大的厄运。而地方上手握实权的实力派官僚们却大多对废黜德宗表示反对，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还有不久前就职的两广总督李鸿章，都清楚极端保守势力的扩张最终将威胁到他们赖以支柱的传统秩序。在慈禧决策开战的过程中，他们都被排斥在外。当然，如果他们身在其中，也不可能同意宣战，这是双方都心照不宣的。

清廷与列强的矛盾正如前面所述，由来已久，但载漪显然操之过急了。在这一点上，他狂妄自大的本性暴露得最明显。由于得不到洋人的支持而使废黜德宗的计划搁浅，这一直让他耿耿于怀。为了解决这个障碍，他企图通过对列强的强硬态度来迫使他们低头。恰在此时，义和团正在华北的农村地区风起云涌，提出的口号主张正好与他想达到的目的相合。他便鼓动自己的亲信对其推波逐澜，扩大声势影响，造成普遍的仇视洋人的情绪。在北京的义和团就公开打出了诛杀“一龙二虎”的旗号，所谓“一龙”自然是指光绪帝，“二虎”则是庆亲王和李鸿章。这时的义和团运动其实已经蜕变成被上层政治势力操纵的民众狂热，其革命意义已经不复存在。

清廷决策的第一个重要事件就是保定验功。当慈禧从载漪等人口中听到了已经被传得神乎其神的义和团的情况时，她也以为借此打击洋人在中国的气焰、进而完成废黜德宗的目的是易如反掌的。但为了谨慎起见，她还是派遣刚毅和赵舒翘前往保定，勘验义和团所谓的“刀枪不入”之类“神功”是否属实。然而刚毅早就是载漪拉拢的满族大臣之一，而赵舒翘只是一个刚刚提拔起来的新进官僚，不得不依附于刚毅的意见。在这样一支明显带有目的的调查队“勘验”之下，所谓“神功”越发神奇强大，直糊弄得慈禧连声说好，从此，清廷开始由中枢机关正式支持义和团与洋人的对抗行动。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作为最高决策者的慈禧闭目塞听，丝毫没有辨别意识，纵容载漪的党羽在眼皮底下胡作非为，并且最后还被如此荒谬的“神功”轻易冲昏了头脑，可谓昏聩之极。

第二个决定列强态度的事件就是围攻使馆。当各国使节感到义和团的排外情绪已经威胁到他们的安全时，他们照会清政府准备离京。此时骄横的满清贵族们根本不理睬他们的去留，在毫无安全保卫与警示的情况下发生了德国公使克林德遇刺案。当使节们问讯清政府能否保证到天津的安全时，荣禄等人却给出了听任自便这种不负责任的空头回答。使馆区的各国使团和军队经过协商，决定固守东交民巷，同时向国内请求援军。清政府的昏庸官僚丝毫不理解现代的外交制度、礼仪和规范，以为单凭着傲慢的回答就能保持中华上国的威风，根本没有意识到使馆对于一国的重要地位。载漪及其党羽在事件中扮演了排外急先锋的作用，荣禄本应当利用自己为慈禧信任的地位降低动乱的程度，但却最终倒向保守势力，而慈禧的纵容更让这种狂热在京城蔓延。在这之后，中国和列强实际上已经处在战争状态。

第三个也是最为悲壮的转折点就是御前会议。慈禧在看到使馆冲突已经上升到战争级别时，在载漪等人操纵下，她决定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来讨论宣战与否。久已未公开活动的光绪皇帝也将出席。当荣禄探听到列强准备大举入侵的消息时，他连夜起草了密褶，在密褶中他主张对列强开战，这对慈禧的决策有着巨大的影响。所以当第二天御前会议召开时，会议的结果就已经注定。但在会议上异乎寻常的一幕进一步加重了整个事件的悲剧气氛。一位史家后来这样描述：

慈禧在会议一开始就宣布她已经决定对万国开战，但大家有什么话还可以不妨直说。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说：“拳民法术，恐不可恃。”载漪说：“其心术可恃。”慈禧问立山，立山说：“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验。”载漪说：“用其心耳，奚问术？立山必与外人通，请以立山退外兵。”立山说：“首言战者载漪也！臣主和，又不谙外事，不足任。”联元壮着胆子说了一句：“若与各国宣战，异日洋兵入京，恐无孑遗。”慈禧一听，勃然大怒，有人斥责联元说：“此何言也！”光绪皇帝对自光绪十年便开始出使西欧各国的许景澄说：“汝出洋多年，外间情势，汝尽知晓，能战与否，汝当明白告朕。”许景澄说：“闹教堂、伤教士之交涉，向来皆有办，如若伤使臣、灭使馆，则情节异常重大，国际交涉中罕有此成案，不可不格外审慎。”光绪皇帝深知其中厉害，见慈禧一意孤行，明知不可为偏为之，不禁悲从心来，控制不住自己，“执景澄手而泣之”，袁昶也走上前去，于是，令后来读史者唏嘘不已的一幕出现了，庙堂之上，廷议之时，君臣三人竟围在一起在众人面前哭了起来。慈禧大怒：“成可体统！”

清廷决定开战后，于1900年7月28日、8月11日分别将主和的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和联元等五人处死。许景澄与袁昶同时入狱，“指定分系南北所，当在狱中分道时”，袁昶紧握许景澄的手问道：“人生百年，终须有一死，死本不足惜，所不解者，吾辈究何以致死耳？”许景澄笑答：“死后当知之，爽秋（袁昶字爽秋）何不达也。”

最终，慈禧的一意孤行把清政府、也把她自己逼到了不得不化妆出逃、饥寒交迫、卤素荒野的结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清廷向各省发布宣战诏书、要求他们派兵勤王时，李鸿章丢开了他那些尚在观望的同僚，以一封八个字的电报点中了此决策的死穴：“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我们在读到这段历史时，除了唏嘘感叹，不禁会反思，这种专制野蛮的政治体制的确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连李鸿章这位天下第一裱糊匠都不愿再补，历史已经在此时掘好了它的坟墓。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吧：“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2010/5/14